

民间笑话的 民族志研究

以万荣笑话为例

王旭◎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民间笑话的 民族志研究

以万荣笑话为例

王 旭◎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间笑话的民族志研究:以万荣笑话为例/王旭
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ISBN 978-7-100-17245-5

I. ①民… II. ①王… III. ①笑话—文学研究—
万荣县 IV. ①I20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59887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民间笑话的民族志研究:以万荣笑话为例

王旭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7245-5

2019年6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2 1/4

定价:58.00元

序 言

笑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领。婴儿刚出生已能在睡梦中露出微笑，还不会说话却能拍手大笑。此后的一生中不仅自己会发出各种笑，同时也将领受他人的各种笑。笑能够表达情感上的满足，也可以宣泄内心的压抑与冲突；能够表达赞美，更可成为讽刺他人和社会的武器。由于笑具有如此重要的位置和意义，因而人类从古至今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笑的文化，比如通过绘画、雕塑、文学和影视创作等方式，来描绘美好的笑或者丑恶的笑。美国艺术史研究者安格斯·特鲁贝尔（Angus Trumble）所著《笑的历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中，便列举出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不同性质和功能的笑，涉及礼仪、淫荡、欲望、欢愉、智慧、欺骗等。而笑话（joke），便是人类创造的笑文化中璀璨茁壮的一支。

笑话是引人发笑的综合性语言艺术，其中那些为人民大众广泛传承的笑话，被称作“民间笑话”。从古至今，笑话流播不断，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就中国的情形而言，早在先秦时代，诸子散文中就记录了诸多笑话，比如《刻舟求剑》《郑人买履》等，以后更有专门辑录笑话的《笑林》《应谐录》《笑府》《广笑府》《古今谭概》等专门的笑话集出现，充分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幽默和智慧。直到今天，笑话依然同人们的生活相伴相生，从消遣娱乐场合比如友朋

相聚、睡前闲谈直至正式的外交、授课以及商业谈判等场合，都可以发现笑话的踪影，特别是借助微博、微信等新兴电子媒介，笑话（如今常被称为“段子”）更被迅速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此外，笑话的内容、致笑的方法以及讲述方式等，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鲜明的地方性。比如机智人物笑话以及种族笑话，便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不过与此同时，讲述者以谁为笑的对象、为何以之为对象、讲述笑话的动机和方式等，则因地因人而异，从而使笑话与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生活和表达需求密切关联。

然而，尽管笑话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出现且具有重要地位，相关研究却一直相对薄弱，与神话、传说、故事、民歌等文类相比，对笑话的研究显然偏少。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如同本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一是由于笑话往往篇幅简短，人物和结构简单，讲述过程短暂，因此不仅受到一些研究者的忽视和轻视，也使对它的研究具有较大困难；二是由于笑话的讽刺性强，而且嘲讽的话题百无禁忌，有时不免与现实世界的道德、伦理、政治或学术评判标准格格不入，因此导致它“难登大雅之堂”，一直处于学术研究的边缘地位。在中国，对于民间笑话的有限研究主要集中在民间文艺学领域，而且迄今为止，相关探讨大多局限在静态的、大范围内的文本比较和分析，很少聚焦于笑话如何在特定地域的日常生活中被人们作为表达资源而生动鲜活地加以运用，因而未能在学术研究中有力彰显出笑话的地方属性和生活属性，而后者，恰好是笑话生命力的关键。

在这样的背景中来看王旭博士的新著《民间笑话的民族志研究：以万荣笑话为例》，其学术价值便显而易见。该书是近年来中国民间笑话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之一，作者通过民族志式田野研究的方法，

深入探讨了山西万荣笑话与当地社会之间的多种关联，为民间笑话的语境研究提供了一个出色的范例。该书致力于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在一个特定区域内，为何讲笑话会成为一种标志性的文化现象？当地的笑话讲述群体有哪些，他们如何讲笑话，日常行为与笑话讲述之间有什么关系？笑话作为一种表达资源是如何被使用的，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心态？作为一种地方性的口头传统，笑话的传承和演变与地方社会之间有何关联？”作者希望通过万荣笑话的个案研究，“一方面推动民间笑话的理论建设和个案剖析，另一方面从那些笑中带泪的笑话里通向人们美好、真实的生活世界”（绪论）。从目前出版的情形看，作者为自己确立的这些任务基本上都较好地完成了。

首先，该书比较深刻地揭示了笑话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密切联系。该著的一大特色和成就，就是将对笑话的考察置于一个特定的时空和文化场域中，生动、细致、深入地考察了作为地方文化传统的笑话，如何在山西万荣这片土地上产生、传承和变迁，指出万荣笑话是万荣地方社会中不断传承的口头艺术和生活传统（结论）。万荣笑话在产生之初被当地人称为“谢村 Zèng”，是邻村人讲述的有关谢村的傻人傻事。改革开放以后，万荣笑话逐渐被打造为当地的标志性文化，成为“万荣精神”的象征；在当下的文化产品生产、遗产旅游、公务交往等非日常生活语境中，万荣笑话也被讲述、挪用和重构，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价值和功利作用。因此，笑话不仅仅是民众日常生活的表达资源，还是区域经济文化建设的地方资源，是联系谢村与周边城乡之间的重要纽带。本书生动地描绘了笑话在万荣人的日常生活中所发挥的多种功能，以及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在地方

文化复兴和重建过程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突显了笑话的地方属性和生活属性。

其次，该书为民间笑话的语境研究提供了出色的范例。20 世纪后半叶，世界民俗学的研究范式经历了从以“文本为中心”到以“表演为中心”的转向，对语境、过程和表演者的关注成为晚近盛行的学术取向，这一转向的发生与表演理论（performance theory）的推动有直接关系。语境并非指泛泛的社会背景。在表演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看来，尽管“民俗学一直是语境主义者的事业，因为民俗学者总是认为民俗文本与其他某些事物相关；尽管这相关的事物千差万别：同源的文本，特殊的社会构成，某一群体的集体精神，进化发展的某个阶段”等，对于表演取向的民俗学者来说，其语境观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注意力聚焦于“实践的情境性语境”（situational contexts of use），即由地方性所规定的情境、事件、现场（scenes），民俗形式和实践在其中作为“生存的必需品”资源而引导社会生活（理查德·鲍曼，《表演中的文本与语境：文本化与语境化》，杨利慧译，《西北民族研究》2015 年第 4 期）。前文已指出，由于笑话篇幅短小，人物和结构简单，讲述过程又十分短暂，往往稍纵即逝，因此对它的语境研究具有很大困难。王旭博士却不畏艰难，敢于接受挑战！她认真汲取了表演理论的主要思想，将万荣笑话理解为一种表演模式，即以交流实践为基础、在表演者和观众之间形成的话语生产和接受的框架（或模式），考察万荣笑话在日常生活（第二章）、乡村舞台（第四章）和旅游景区（第五章）等多种语境中的生产和表演过程，进而分析不同语境中笑话的讲述者与听众、演员与观众、导游与游客之间形成的不同类型

的笑话表演模式。这一成果对民间笑话的语境研究提供了富有创造性的范例，展现了笑话如何被富有创造性的个人所传承并变异的一个个鲜活灵动的瞬间，不仅有力突显了笑话作为交流资源的活泼生机，也为表演理论的本土化探索提供了可贵的新成果。

最后，有力推进了笑话本体论的建设。前文曾说过，笑话研究相对薄弱，有针对性的专门理论较少，许多有关笑话本体的基本问题，比如笑话的界定、笑话与民间故事的关系、笑话与幽默的关系、笑话的文类特征等，都缺乏充分讨论，所以不少学者在谈到笑话时不免将一般民间故事的理论套用在笑话之上，这更造成了对笑话特殊文类属性以及本体特征的深入探讨的缺乏。王旭的探究没有满足于对地方社会中笑话生存状态的描述，而是在描摹事实的基础上，进一步条分缕析，提出了一些富于创见的理论观点。比如，她借鉴“传说圈”和“故事圈”理论，提出了“笑话圈”这一概念，并划分出笑话圈辨识的四个维度：区域基础、主体基础、语言基础、本体基础，通过这四个维度来划定一个笑话圈的大致范围，进而与其他笑话圈进行区分，以突显笑话的地方特性（第一章、结论）。笑话圈概念的提出，对于研究者认识笑话的传播特点及其地方性特征，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书中还提出了其他富有启示性的观点，比如笑话具有艺术性和生活性双重属性（第二章），在继承中变异的“动态的文类观”（第四章），等等。

总之，该著有诸多创新之处，观点鲜明，逻辑清晰，论证严密，文笔流畅，分析也较为深入，对现有笑话研究是一个重要推进。2016年初夏，王旭以这篇论著作为博士学位论文成果答辩时，得到答辩委员会的充分肯定，认为“该论文的选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突破了过去以‘文本为中心’的静态的笑话研究范式，使笑话从具体的语言文本走向广阔的地域社会和生活传统，有助于深刻理解笑话与地方文化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决议书）。最终该论文获得了“优”的成绩。

当然，本书也存在诸多不足，对于一些重要问题缺乏应有的探讨。比如，本书倡导用民族志方法来研究和书写笑话，可是，这样做的优势和潜力到底在哪里，书中并未予以有力讨论。另外，如同答辩时一些评委指出的，笑话的时代性很强，对万荣笑话的研究也应该注意其中反映出的时代感，以便通过相关研究达到对时代的理解。这些不足，有待作者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思索并做出回应。

最后，作为王旭的博士生导师，我在这里由衷祝贺她的博士论文顺利出版之际，也想对读者诸君稍稍介绍一下我所认识的作者，也许能增加些许大家对本书的理解。王旭硕士阶段就读于山西大学民俗学专业，师从段友文教授。2013年她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师大民间文学专业，在我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由此师生相伴三年。她给我的最初印象是比较腼腆，话不多，但是一旦问到对具体问题的看法时，她立刻侃侃而谈，逻辑清晰，思路敏捷，论述严谨，常让我刮目相看。在其他很多事情上也是如此。记得有一年毕业季，“杨家将”（我们下弟子对自己的戏称）们相约去唱卡拉OK。唱歌期间，王旭一直默默为大家照相，直到有人起哄让她唱一首，她便唱了一首粤语歌曲，结果开口便让大家惊呆了：简直像是原唱！我从此认识到王旭的谦虚内敛与多才多艺。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是非常艰苦的，我常对学生开玩笑说：不掉几斤肉、脱几层皮，写不出博士论文来。王旭写论文期间，压力很大，以至于有段时间身体状况不好，

但是她从不叫苦和抱怨，也并不放松对自己的学术要求，这不由让我心生敬意。王旭是山西太原人，对万荣县特别是谢村原本并不熟悉，为了做好田野调查，她克服了很多困难，甚至春节期间还去村里租房，以便随时随地捕捉村民们的笑话讲述活动。由于她的用心和努力，尽管万荣笑话的讲述在实际生活中即来即去、倏忽短暂，但是最终经由她的敏锐观察，得以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丰富鲜活的绮丽风景。

王旭的名字有“初升的阳光”之意，显然寄予了父母对她的美好期望。欧美学者在给青年学生写推荐信时，常用的赞誉性表述也是“a rising star”。我在阅读王旭的这第一部著作时，由衷地感受到一颗新星的升起。希望年轻的作者在未来的岁月中能继续不折不挠、勤勉奋进，为包括笑话在内的中国民间文艺学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是为序。

杨利慧

2019年5月4日于北师大

目 录

绪 论 作为表达资源的民间笑话	001
第一节 从“笑话研究”到“笑话学”	005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价值	027
第三节 理论与方法	036
第四节 相关术语简释	046
第一章 万荣笑话的生命史：笑话圈的形成与变异	054
第一节 笑话传统与笑话圈的形成	056
第二节 “谢村 Zèng”与笑话圈的兴盛	073
第三节 万荣笑话与笑话圈的变异	083
小 结 讲笑话是一种生活传统	096
第二章 消遣的艺术：万荣笑话的日常生活讲述	099
第一节 笑话讲述的村落语境	100
第二节 从日常生活到笑话叙事	116
第三节 笑话讲述活动与村落生活秩序	149
小 结 笑话具有艺术性和生活性双重属性	176

第三章 从经验到知识：万荣笑话的文本化	179
第一节 笑话集：文字文本的生产	181
第二节 表演与书面：《立碑为证》的文本对读	202
小 结 “知识的笑话”与“经验的笑话”	219
第四章 万荣笑话剧：舞台展演与文类重建	223
第一节 综合舞台艺术：万荣笑话剧的文类特征	224
第二节 文类重建：以《憨女婿学唱戏》为个案	264
小 结 动态的文类观	283
第五章 遗产的生产：万荣笑话的产业开发	287
第一节 “中华笑城”：文化生产的一种模式	289
第二节 “笑博园”：遗产旅游中的景观化表演	314
小 结 被建构的地方文化	344
结 论 万荣笑话是地方社会中不断传承的口头艺术和生活传统	347
主要参考文献	367
后 记	376

绪 论 作为表达资源的民间笑话

民间笑话是流传于广大民众之间的喜剧性短篇故事，它取材于日常生活的片段，结构短小、情节巧妙、语言辛辣，通过戏谑、诙谐、夸张等艺术表现手法，叙述生活中出人意外的滑稽人物和事件，达到讽刺、幽默和引人发笑的目的。作为一种活态的口头语言艺术，民间笑话在讲述时伴随有声音、表情、动作等鲜明的副语言特征，具有表演（performance）^①的性质。

与神话、传说、幻想故事、生活故事等其他民间叙事相比，笑话的体量小、人物少、情节简单，且常常带有贬损、嘲笑或情色意味。鲁迅曾说“中国唯一称得上笑的传统的，便是说笑话和讨便宜的传统”^②，将“说笑话”与“讨便宜”等同而论，显然评价不高。正是基于这些容易察觉的外部特征，民间笑话在历史上一直被文人学者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玩意儿”，甚至粗俗、猥亵的污言秽语，备受学界冷落。但是，学者们无法回避的一个社会事实是：当

① 本文所使用的“表演”（performance）一词，借鉴了美国民俗学者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所持有的表演观，即表演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化的交流方式。参见〔美〕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杨利慧、安德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② 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1页。

神话、传说、幻想故事等许多民间文学文类（genre）都不同程度地遭受现代化工业的冲击，令人不免担忧其未来还能传承多久多远之时，民间笑话却没有丝毫衰落的迹象，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一直保持着极为旺盛的生命力。

从内容来看，民间笑话贴近生活，包容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便是官方话语中那些三缄其口的与政治、宗教、民族、两性、灾难、伤痛等相关的神圣、隐晦或敏感的内容，在笑话的嘲讽和戏谑中也失去了禁忌的光环。从形式来看，现代工业社会中，大部分笑话的形式是国际的，其产生和传播过程日渐缩短，流行频率也不断加快。^①它总是紧跟时代潮流，尤其是当下借助微博、微信等新兴电子媒介，第一时间反映时事热点的网络笑话铺天盖地而来，席卷世界各地。从讲述者来看，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参与着笑话的讲述、创造与传播，通过对笑话这一表达资源的使用，释放了内心的压力和情绪，有效地表达着思想情感和对世界的认知。可见，笑话在民众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事实上，自古以来笑话的社会功能就已经得到许多人的认可。清代石成金在《笑得好》中指出“笑话醒人”，可治“沉痾痼疾”，可谓一剂“猛药”；明代冯梦龙的《笑府》、清代陈皋谟的《笑倒》也都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两人分别将“古今世界”比作“一大笑府”，将“大地”视为“一场笑”，“装鬼脸，跳猴圈，乔腔种种，丑状斑斑”。^②他们站在平民大众的立场上，借笑话嘲弄世间，肯定了

① 王杰文，《民间笑话三论——对西方民间笑话研究成果的译介》，《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3期。

② 参见周作人校订，止庵整理，《明清笑话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笑话的讽刺和批判作用，使笑话从纯粹娱乐消遣的手段提升为社会改良的工具。作为一种草根的表达方式，笑话中充满了贬损、挖苦、荒诞、粗俗、猥亵等看似品味低下的嘲讽和幽默，但这只是容易被别人发觉的表象，实质则是底层民众面对压力、困境、强权、不公时的一种日常反抗形式，也就是美国政治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所说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和“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由于处于政治底层的平民大众不掌握“公开的文本”（public transcript），所以只能通过发生在“后台”（offstage）的话语、姿态和实践，避开统治者的直接监视，在其背后说出对权力的批评。^①从这一层面来看，人们不仅通过讲笑话的方式来发泄不满、搞笑逗趣，人们创作、讲述笑话的过程，就是创造“隐藏的文本”的过程，表现了一种低姿态的反抗形式。长久以来，人们总是习惯于研究优雅的趣味，殊不知“笑”与“泪”从来都是相生相伴，那些看似粗俗、“不正经”的笑话却是对最深沉的苦难和伤痛的喜剧化表达。因此，对民间笑话的关注和研究，有助于理解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政治行为和复杂情景下的权力关系，探究一个时代的道德边界和社会心态，阐释民间表达如何促进了社会意义的建构。这正是民间笑话这个小文类所潜藏的大能量，也是本书所具有的宏阔的现实意义。

至于本书为何选择万荣笑话展开研究，缘于七年前的一次田野调查。2011年，硕士在读的我参与了导师段友文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古村镇文化景观整体保护与扶贫策略研究——以山西‘三河一关’20个古村镇为中心”，随项目组前往山西多个古村镇进

^① 参见〔美〕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

行实地考察。其中，山西南部运城市万荣县阎景村引起了我的注意。阎景村是由国家住建部、文物局评定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清代晋南首富李子用的家宅“李家大院”坐落于此，与李家大院一街之隔的是另一个景点“中国万荣笑话博览园”（简称“笑博园”）。在笑博园内，没有与当地重要历史事件、人物或传统文化相关的遗址和风物，所有景观皆依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万荣笑话转化和打造而成，构建起一个以笑话为主题的乐园。我对这种新颖独特的旅游开发模式颇感兴趣，也不禁思考：笑话这种碎片化、片段式穿插于民众日常生活之中的民间文学文类，是如何从口头转化为文字和景观的？当地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是否喜欢讲笑话，这种转化与当地的口头传统之间有何关系？

带着初次调查时产生的这些问题，两年后我对阎景村进行了回访，在与许多村民的交谈中发现他们对讲笑话并无太大热情，对万荣笑话也知之甚少。从村民口中得知，原来在距离阎景村20多公里的万荣县西，还有一个万荣笑话的发源地谢村。同时，在万荣县城内还聚集着一批地方文化人，满怀激情地参与着万荣笑话的讲述和传承，推动着万荣笑话的遗产化和产业化进程。随即，我又前往谢村和县城展开调查，收获颇丰。通过这次对万荣县阎景村、谢村和县城的调查，我发现作为一种地方性的口头传统——也是一种生活文化和地方性知识，万荣笑话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时空变迁历程，形成了多样化的生存和传播形态，它从多方面影响着当地民众的生活和认知，发挥着重要的现实功能。另外，从全国范围来看，万荣笑话被评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各地同类民间笑话中屈指可数，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本书以万荣笑话为研究对象，正是在田野

调查的基础上，考虑到它在民间笑话中的典型性、时空和内涵变化的复杂性以及当下活态展演和重构的现实性。本书关心的主要问题有：在一个特定区域内，为何讲笑话会成为一种标志性的文化现象？当地的笑话讲述群体有哪些，他们如何讲笑话，日常行为与笑话讲述之间有什么关系？笑话作为一种表达资源是如何被使用的，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心态？作为一种地方性的口头传统，笑话的传承和演变与地方社会之间有何关联？希望通过万荣笑话的个案研究，能够回答上述问题，一方面推动民间笑话的理论构建和个案剖析，推进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区域经济文化建设的合作共赢；另一方面从那些笑中带泪的笑话里帮助人们通向美好、真实的生活世界。

第一节 从“笑话研究”到“笑话学”

回顾中外民间文学百余年的学术史，关于民间笑话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多，显得零散和薄弱。但是，如果我们细细梳理、品味，就会发现有不少成果令人眼前一亮，闪烁着恒久的光辉。本书对国内外民间笑话的已有成果进行了详细梳理和分析，其中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成果：一是国外的笑话研究；二是国内的笑话研究；三是万荣笑话的个案研究。通过对这些成果的历史爬梳和横向比较，从对象认知和学术实践的角度，可以归纳出国内外笑话研究史的发展轨迹和研究范式。

一、形而上的哲学演绎

粗略地考察一下民间笑话的现有理论，会发现关于“笑话是什